

一项历史考察:鲍罗廷与孙中山 1924 年北上

周利生, 徐 磊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鲍罗廷认为,1924年北京政变为扩大中国国民革命的影响提供了机会,因此支持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北上途中绕道日本,鲍罗廷意识到这是一个“暗礁”,但又认为日本之行会对孙中山的“亲日”情绪有所消弭,因而并未坚决反对。孙中山抵京后,虽身患重病,但与鲍罗廷关系依然密切,其对待善后会议的策略上,就不乏鲍罗廷的影子。

关键词:鲍罗廷;孙中山;北京政变;北上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0)02-0112-07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Borotin and SUN Yat-sen Went North Together in 1924

ZHOU Lisheng, XU Lei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Borotin thought that the 1924 Beijing coup offered an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 influences of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so he supported SUN Yat-sen going north. SUN Yat-sen made a detour to Japan on his way north. Borotin realized this was "a hidden rock", and believed that a clear trip to Japan would alleviate SUN Yat-sen's "pro-Japanese" sentiment, so he did not firmly oppose. After he arrived in Beijing, SUN Yat-sen was seriously ill, but he was still close to Borodin, and there was no lack of Borodin's shadow in his strategy of dealing with aftermath meetings.

Key words: Borotin; SUN Yat-sen; Beijing coup; north

孙中山 1924 年北上,是其晚年政治生活中的一件重大事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学术界围绕孙中山北上的思想动机、北上的原因与得失以及北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北上与日本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研究。^①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有关档案资料的开放,学术界开始关注共产国际、俄共(布)以及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与孙中山北上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些成果。^②不过,鲍罗廷为什么会支持孙中山北上,如何看待孙中山绕道日本,国民党出席善后会议与鲍罗廷是什么关系等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理清。

① 例如:廖永武:《欢迎孙中山北上与国民会议运动》,《天津师大学报》1985 年 1 期;刘曼容:《孙中山北上与其实行“中央革命”的设想》,《广东社会科学》1990 年 2 期;魏宏运:《1912 年孙中山北上的追求》,《民国档案》1990 年 4 期;刘曼容:《1924 年孙中山北上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1 年 4 期;周兴樑:《冯玉祥北京政变与孙中山北上谋和平统一祖国》,《贵州社会科学》1991 年 8 期;刘曼容:《1924 年孙中山北上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3 年 3 期;陶水木:《中共对 1924 年孙中山北上态度的演变及其原因》,《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 年 4 期;刘曼容:《1924 年孙中山北上的原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1999 年 4 期,等等。

② 马铭德:《试探莫斯科与孙中山北上的关系》,《“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 年 11 月;曾成贵:《弄潮:鲍罗廷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版;李杨:《鲍罗廷与孙中山北上》,《广东社会科学》2016 年 1 期,等等。

收稿日期:2019-0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研究”(编号:18VSI010)

作者简介:周利生(1968-),男,湖南永州人,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徐 磊(1986-),男,江西临川人,江西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1924 年下半年,北方反帝反军阀的群众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7 月,北京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50 多个团体,在北京联合发起群众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运动,发行《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联盟会刊》,倡议定 9 月 3 日至 9 日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周”。舆论评价曰,该运动“就是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被压迫的民众,日常生活需要上的一种必然的觉醒,也就是我们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一步重大工作”。^[1]在群众反帝运动的影响下,军阀内部发生分化。1924 年 10 月,冯玉祥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首领曹錕、吴佩孚控制的北洋政府,是为“北京政变”。随后,冯玉祥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其时,孙中山表示支持北京政变,赞扬冯玉祥“义旗聿举,大愾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并表示接受冯玉祥的邀请,“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2](p252)}

北京政变发生后,鲍罗廷向莫斯科扼要通告了北方局势的上述变故:“政变的结果是,10 月 23 日北京政权落入所谓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的人民军手中。冯玉祥发出关于发动了政变和在北京召集会议,以解决新的国家建设问题的通电。”^{[3](p564-565)}不过,北京政变后的形势发展并不利于冯玉祥。盘踞长江一带的直系势力宣称,“对北京所发命令,概不承认”;^{[4](p501)}被视为苏联“最凶恶的敌人”^①的张作霖,率奉军抵达北京,气焰极旺,并与段祺瑞沆瀣一气,其“深足为苏联之危害”。^{[5](p2628)}

对于苏联来说,日本无疑是其在远东的巨大威胁。十月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俄国的干涉中,日本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日本曾以“庙街事件”为借口,于 1920 年 6 月占领了阿穆尔省,随后占领了库页岛北部。当时,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之所以派人在中国开展活动,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需要之外,对抗日本以保护国家利益乃是一个重要因素。^②鉴于北京政变后中国政局的这一变化,苏联在加强对冯玉祥国民军援助的同时,促成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联手,成为对抗亲日派段祺瑞、张作霖等的重要策略。苏联的这一立场,不能不成为鲍罗廷支持孙中山北上的重要缘由。

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应该如何应对北京政变?身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指出了两种可能的应对之策:要么“只限于发表一般的声明,说北京发生的仅仅是一些军阀取代另一些军阀的政权更迭”,要么“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3](p565)}鲍罗廷持的是后一种态度,即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上。

其时,对于孙中山北上这一中国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事情,各方看法不一。鲍罗廷意识到,“中共中央反对孙逸仙北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同样出现了反对孙逸仙北上的意见”。^{[3](p565)}的确如此。1924 年 10 月 29 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 89 期发表多篇文章,明确反对孙中山北上。^③吴铁城回忆当时国民党内部对于孙中山北上的态度时说:“有些同志,力表反对。”^{[6](p149)}

中共中央为何反对孙中山北上?鲍罗廷分析认为,中共中央基于对北京政变本身的评价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革命运动的影响,觉得北京“实质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北京政变与“国家的解放事业”没有关系。^{[3](p565)}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就认为,“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者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了一个新工具——冯玉祥”。^[7]中共早期重要理论家和宣传家蔡和森甚至将冯玉祥视为“英美帝国主义的宠儿”。^[8]时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的赵世炎在北方区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发表题为《冯玉祥配称革命么?》的文章,否定北京政变“是一种革命的行为”。^[9]

可是,在鲍罗廷眼中,冯玉祥“是反对‘帝国主义者’的革命的军人”,^{[10](p28)}并将其视为中国革命需要争取的对象。冯玉祥回忆中提到这一情况,“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

① 《维经斯基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第 1 册,第 204 页。

② 1920 年 9 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领导人、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把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他的指示归纳为四条,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他因此指出:“鉴于我们一直需要‘组织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利用自己的‘使者地位’在完成其它任务的同时,坚持在东亚各国人民当中开展共产主义宣传的工作。”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丛书》第 1 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8、39 页。

③ 如:独秀:《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和森:《北京政变与国民党》《北京政变之内幕及其结果》;述之:《北京政变与投机无耻的公团之请求》,等等。

“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等一类习题。我和他们说,中国的目的只是争取自由平等,谁能赞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谈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11](p342)}对待冯玉祥及北京政变,鲍罗廷的主张与莫斯科方面是一致的。苏联《真理报》连续发表文章,称北京政变“不仅使孙中山而且使整个中国民族民主运动有机会振兴起来”,^{[12](p64)}“使民族解放运动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新的发展并成为今后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因素”。^{[13](p73)}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等所主导的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反对孙中山北上的观点松动了。1924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告指出:“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14](p300)}

当然,孙中山是否北上,关键取决于国民党方面的态度。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内部存在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声音,是出于国民党本身的前途命运的考量。孙中山北上后将面临两难的选择,或者继续“捍卫”过去颁布的“国民党的激进纲领”,从而不可能与北京政变中的胜利者合作;或者是“抛弃”国民党的这些纲领,那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分裂”。如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重复国民党过去犯过的老错误”,就如武昌起义后孙中山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其结果是革命运动为军阀服务。^{[3](p565)}与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悲观态度不同,鲍罗廷从非常积极的角度看待北京政变,认为北京政变“给国民党提供了一个登上国民革命斗争大舞台并成为大政党的极好机会”,“如不利用这一机会,不仅从策略上看是错误的,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应该发表宣言”,孙中山“应该北上”。^①

鲍罗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中国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至中国同盟会,其活动区域主要是在南方,在北方难以对革命民众产生政治影响。“国民党此时在北方,除了在青年学生和教授团体中蓄有一种潜势力,表面上似尚无何种能力,所以那些军阀巨头,除了冯玉祥眼光比较的锐敏,极力和党中的领袖接近外,大都不十分注意国民党。其有注意及于它的,或者只把它看作一种思想简单的学生无意识的胡闹,或则把它看作一种赤化过激的恶魔。”^{[4](p502)}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国民党组织的壮大,也无助于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的推进。

事情的发展,正是鲍罗廷所期盼的。1924年11月1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除鲍罗廷外,与会者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伍朝枢、邵元冲、谭延闿等。会议上,鲍罗廷的观点“占了上风”。^{[3](p566)}这次会议决定,孙中山“离粤北上宣言为统一中国”,“先往上海发表主张,如北方能同意,然后与之合作”。^{[15](p173)}11月10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的主张。^{[2](p297)}

二

1924年11月14日,孙中山乘永丰舰离开广州,次日抵达香港,随后改乘日本邮轮“春阳丸”号赴上海。据鲍罗廷说,孙中山原计划提前一个星期即11月6日从广州出发,乘英国或者美国的轮船去上海,但是,“驻广州的日本人热情地建议孙乘14日的日本轮船”。鲍罗廷对日本人的这一提议心存担忧,提醒孙中山说:“您是否认为,他们在尽力拖延您此行的时间。即使拖延几天也有很大意义,因为您不在北京,日本较容易利用北京的政变。”^{[3](p569)}

鲍罗廷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11月10日,段祺瑞在天津会晤张作霖、冯玉祥,是为“天津会议”。会议决定拥段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11月24日,段在北京就职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组成执政府。12月24日,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十三条。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受到排挤,被调离北京,前往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其结果,孙中山北上面临的对手已经是亲日的奉系张作霖和皖系段祺瑞军阀势力控制的北京政府。孙中山后来在日本神户演说时的一段话,事实上认可了鲍罗廷的提醒:“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象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象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2](p378)}此乃后话。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丛书》第1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页。

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11月21日,孙中山离开上海,偕宋庆龄等搭乘日轮“上海丸”取道日本赴天津。孙中山为什么绕道日本呢?他当时宣称:“因为在上海没有船位,就是半个月之内也没有船位,由上海到天津的火车又不通,所以绕道日本到北京去。”^{[2](p372)}后来各种史书也大都解释为上海北行车船受阻而临时决定的。^①

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鲍罗廷深知,“孙逸仙早就有访问日本的想法”,“为的是试探一下对他的建立中、日、俄联盟思想等的反应”。^{[3](p569)}正因此,11月12日,孙中山致电日本泽村幸夫,提出“中日提携合作”,“确立东亚之和平”等观点。^{[2](p310)}当时,孙中山还派李烈钧赴日发起组织亚洲大同盟联络、宣传工作。^②李烈钧在日本的一次谈话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孙中山的意旨:“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③当孙中山11月17日抵上海时,从日本返国的李烈钧已抵沪。李极力劝说孙中山绕道赴日,更坚定了孙中山赴日的决心,“乃定取道日本之计”。^{[16](p83)}

鲍罗廷意识到,“孙逸仙取道日本的问题是国民党代表团途中第一个暗礁”。^{[3](p567)}加伦将军对绕道日本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孙中山日本之行一来不合时宜,二来徒劳无功”。^{[17](p115)}国民党内部有人则担心孙中山的日本之行会伤害与英、美的关系。但是,鲍罗廷并没有阻止孙中山的日本之行,而是“支持孙中山去”。^{[18](p25)}在鲍罗廷看来,“在孙逸仙的脑子里对日本的幻想根深蒂固,他早就有建立中、日、苏俄联盟的思想”,“现在时局向他提供了访日的机会,要阻拦他走这一步是非常不明智的。除了他从日本之行中获得的亲身感受,没有什么能作为消除他对日本的幻想的有力的论据。此次赴日只会使他变得聪明一些”。^{[3](p568)}

事情正如鲍罗廷所料,孙中山日本之行遭到了日本官方的冷遇。孙中山抵达神户时,政府要员无一人露面,与孙中山有过联系的各界要人如犬养毅、涩泽、田中义一等也极力回避,日本政府甚至拒绝孙中山到东京去。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表示:“孙赴天津途中在日本停留,来东京与有力者会见,已为一般人所误解。恐怕这将对孙产生不利的结果。”^{[19](p2072)}孙中山两手空空地离开日本,一腔热忱和希望化为泡影,“短短的日本访问成为孙中山的痛苦回忆”。^{[18](p25)}有描述,当时“一瞬间,亲日情绪油然而生,党政要员无不陶醉于这种情绪之中,及至孙中山抵达天津,喧嚣一时的亲日情绪才渐渐消退,到12月上半月,人们就已完全清醒过来了”。^{[17](p115)}孙中山很失望地对马伯援说:“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为吾人未获得政权。”^④

离开日本后,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在天津期间,孙中山与张作霖进行过面对面的会谈。北京《晨报》(1924年12月6日)和上海《申报》(1924年12月8日)登载了孙中山与张作霖谈话的内容,大意是:张作霖劝孙中山放弃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孙中山则要求张作霖提倡废督裁兵;依赖日本的张作霖试图使孙中山抛弃联俄政策,由其作调解人与各国公使修好。张作霖公然说:“我是一个捧人的,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19](p2088)}鲍罗廷向莫斯科通报了这一情况:“张作霖竭力要孙逸仙断绝与我们的联系,并答应他只要这样做,他就可以得到帝国主义者的各种支持。”^{[3](p570)}在天津与张作霖会谈后,孙中山告诉鲍罗廷:“我过去不了解张作霖,这次我很有兴趣地听了他对各个问题的看法。我并不想让与我们站在绝然不同立场上的人相信什么。”^{[3](p568)}鲍罗廷称赞道,孙中山“即使在张作霖、段祺瑞以及日本人策划的阴谋包围之中,在病榻上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3](p570)}

① 例如,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734页;李新主编:《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② 1924年10月13日,孙中山致电李烈钧:“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1924年11月,李烈钧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演说时也提到自己乃“衔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孙公使命而来”。参见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031页;《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说》(1924年11月),本书编委会编:《烈火千钧任平生》,团结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③ 详见《李烈钧离日前之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4日)。

④ 详见马伯援著《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版,1985年版,第50页。

三

到天津时,孙中山已感觉身体不适,肝部隐隐作痛。12月31日,孙中山离开天津,“承医生劝告,即日与疾入都,选择医疗”。^{[2](p532)} 鲍罗廷解释说:“孙逸仙的病变成了慢性的,天津缺乏较好的医疗条件,居住条件也很差,一方面需要把孙逸仙转移到条件好一些的地方,而只有在北京能为他创造这种条件。另一方面,国内会对他滞留天津而不去北京的原因产生猜疑,因为他本来打算去北京,提出召开真正的国民会议的要求。把生病作为原因是不能让中国人信服的。”^{[3](p570-571)}

与孙中山北上相一致,国民党的决策中心也随之北移。抵京后的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指令“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移至北京”。^{[2](p572)} 鲍罗廷仍旧担任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据邵元冲日记记载,该政治委员会在京期间讨论的议题有:国民会议促进会召集以及国民会议组织法大纲的起草事宜;对善后会议的应对策略;《北京民国日报》的筹办;冯自由、张继的小团体问题;广东局势;唐继尧、胡景翼问题。^① 可以说,孙中山北京病重期间,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国民党处理和决策重大问题的机构。在这一机构中,鲍罗廷“作为顾问出席了所有会议”,^{[3](p578)} 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青年部长、常委的邹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党权不在最高党部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之国民政府,而悉集中于政治委员会。鲍罗廷乃以政治委员会顾问之资格,操纵其间。”^{[20](p136)} 邹鲁所言“操纵其间”,显然带有情绪化色彩,这与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上所表达的观点一致,只是邹、汪二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上作报告时说:“鲍先生赞助总理,总理很采纳他的意见的。”^{[21](p20)} 可见,鲍罗廷对于国民党决策的影响力是无疑的。这种影响力,来源于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建立的信任,即便是孙中山重病卧榻之际依然如此。据当年护理孙中山的护士何芬说:“在中山先生生病的时候,段祺瑞政府曾经数次派人来看望,都被先生严词拒绝了。与此相反,苏联来的顾问鲍罗廷夫妇等人来了,中山先生和他们谈国家大事,一谈就没个完。”^{[22](p509)} 时为孙中山侍从副官的马湘说:孙中山在北京住院,“在施手术时,只限四人进入手术室,这四人鲍罗廷、孙科、孔祥熙、宋子文”。^②

国民党应对善后会议的策略中,就不乏鲍罗廷对孙中山的影响。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在《北上宣言》中明确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出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反对直系的地方实力派、各政党的代表等九部分团体组成。到达上海后,孙中山在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中再次阐述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我这次决心到北方去”,“大概讲起来,是要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成的团体做基础,派出代表来共同组织会议,在会议席上公开的来解决全国大事”。^{[2](p332)} 途经日本长崎时,孙中山在对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中,再次阐述国民会议的主张。^{[2](p367-371)} 孙中山抵京后,又派人分头与“各界接洽”,向民众传布国民会议的主张。^③

可是,段祺瑞执意召开善后会议,并于1924年12月24日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对会员资格作了如下规定:“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此次讨伐贿选、制止内乱之各军最高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四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由临时执政聘请或派充者,但不得逾三十人。”^{[23](p4)}

对于是否参加善后会议,国民党内部“见解各殊”。^{[24](p101)} “主张参加者以必须加入后方可防止其包办国民会议,且对各省军事财政为报告之性质,亦有益。”^{[19](p2109-2110)} 反对者认为,“此会与真正民意无涉,吾党不宜参与”。^{[19](p2109)} 总体看,反对声音甚烈。例如,国民党在天津的要员汪精卫、戴季陶等人曾开会,决定“一切善后问题应由国民会议解决,无必要另行召集善后会议”。^{[19](p2091)} 张继、孙科与汪精卫等人甚至“积不相能”,“愤然去津南下”。^④ 孙中山起初也坚决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段祺瑞公布《善后会议条例》的次日,孙中山就明确指出,善后会议乃“善军阀官僚之后,非善民国之后”。^{[25](p459)} 因

① 参见《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18页。

② 参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页。据说,“中山先生大殓时,李烈钧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引导先行,入协和医院,并用苏联政府赠送的玻璃棺入殓”。见杨仲子:《李烈钧为孙中山治丧》,《团结报》(1985年3月9日)。

③ 详见《孙先生注意宣传》,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12日。

④ 季啸风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此,段祺瑞“派人携善后会议组织大纲赴津,请孙签字,当为孙氏拒绝”。^①针对段祺瑞执政府散布孙中山赞同善后会议的谣言,孙中山立即向各方予以否认,并通过汪精卫致电广东,声明“报载帅座赞成善后会议非事实”。^②

但是,以国民会议代替善后会议,在当时背景下是有难度的。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认为,“不能指望现在的胜利者——中国军阀会采纳国民党的纲领或轻易地同孙中山达成协议,召开这次国民大会”。^{[13](p73)}鲍罗廷与孙中山的观点不一样,主张有条件地参加善后会议。鲍罗廷认为,“对于是否参加段祺瑞的会议的问题,我们(加拉罕同志和我)准备建议国民党作出肯定的决定。当然,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这样就可以把参加善后会议变成宣传国民党行动纲领的最好方式”。^{[3](p571)}(括号内文字为原有,引者)也就是说,鲍罗廷偏向善后会议的内容,而认为不必在名义上与段祺瑞计较。为配合鲍罗廷的主张,中共中央发出《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批评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乃“消极抵抗政策”,“实为国民党改组前之旧病遗毒”,正确的做法是“主张参加,批评善后会议,催开国民会议”。^③

鲍罗廷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在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获得会议通过。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张国焘,在其回忆中写道:鲍罗廷“以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不繁的提出来。因此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这样,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重要的事还是要鲍顾问出来说话,才易于解决”。“首先是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问题。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对段让步,不斤斤于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名称上的争执,但提出两个要求:一、善后会议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的代表;二、军制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归还于国民会议。并保证这两个要求如被容纳,当表赞同善后会议。这个声明就是鲍罗廷征得孙先生同意,向政治会议提出通过的。”^④

于是,1月17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表示可以接受善后会议,并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关于参加善后会议的成员。“善后会议所列构成分子,则似偏重于实力一方面,而于民意方面未免忽略”,“文不必坚持预备会议名义,但求善后会议能兼纳人民团体代表”。二是善后会议讨论的事项。“虽可涉及军制、财政,而最后决定之权,不能不让之国民会议。”^{[2](p562)}但是,1月29日段祺瑞发出答复孙中山的艳电,以会期已近、时间紧张、增派代表赶办不及为理由,拒绝接受国民党方面的建议。于是,在京国民党要人开会讨论段祺瑞的答复,一致认为段祺瑞缺乏诚意,未采纳孙中山的主张,决定对善后会议采取抵制态度。其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宣言:“先生筱电之主张,为本党对善后会议之最大让步,然犹未得段执政之容纳。兹秉本党总理之意,特布宣言不入以善后会议。”^⑤鲍罗廷关于有条件参加善后会议的主张,终未实现。

与此同时,孙中山的病情不断加重。到北京,已确诊为肝脏痼伤。至2月底3月初,已不思饮食,日进参汤维持,胸腹胀满。3月12日,孙中山病逝。鲍罗廷失去了在中国革命中的一位强有力支持者。1925年5月17日,鲍罗廷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全体职员联席会议上回忆说:“我们很痛心的,就是我们丧失了我们唯一的领袖。他奋斗几十年如一日,去岁北京政变,他看到环境上有需要他到北京去的必要,所以他亲身北上,只身去同一切恶势力奋斗。”^{[26](p25)}对于孙中山北上,鲍罗廷依然表示了赞赏和崇敬!

事实证明,孙中山北上广泛传播了革命理念,“唤起北方国民革命的要求,其影响实在太深刻了。

① 《北京二十六日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27日)。

② 参见:《申报》(1924年12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编:《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74页。

③ 《中央政治局对于段祺瑞“善后会议”之议决案》(1925年1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陈独秀也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一文,呼吁国民党“利用出席善后会议的机会发表自己的政纲”,“若以为国民党参加军阀官僚会议是一件羞辱的事,那么中山北上便根本错了”。独秀:《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向导》第100期(1925年1月28日)。

④ 张国焘著:《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0页。

⑤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5日)。

北方大多数的民众都已深印反帝国主义及打倒军阀的决心”。^{[27](p203)}孙中山晚年的这一次政治行动,鲍罗廷给予了大力支持。时人对此亦有肯定性评价:鲍罗廷“裨益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北京政变之后,对于孙先生北上,在国民党内引起很大的争论,而当时力赞其北行的,鲍罗廷之力居多”。^[28]“中山先生的北上,造成了中国全国广大的民众运动,是他(指鲍罗廷,引者)竭力主张与筹画的。”^①

参考文献:

- [1] 文 恭. 国民革命与反帝国主义运动[J]. 向导, 80 期(1924 年 8 月 27 日).
- [2]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A].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丛书(第 1 卷)[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 [4] 李剑农.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 [5] 罗家伦. 革命文献(第 13-15 辑)[M]. 台北: 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8.
- [6] 吴铁城. 吴铁城回忆录[M]. 台北: 台北三民书局, 1960.
- [7] 陈独秀.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J]. 向导, 89 期(1924 年 10 月 29 日).
- [8] 蔡和森. 北京政变之内幕及其结果[J]. 向导, 89 期(1924 年 10 月 29 日).
- [9] 赵世炎. 冯玉祥配称革命么?[J]. 政治生活, 第 20 期(1924 年 11 月 7 日).
- [10] 鲍罗廷.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的演说(1925 年 6 月)[A].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11] 冯玉祥. 冯玉祥自传(第一卷)·我的生活[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 [12] [俄] 拉狄克. 中国的夺权斗争(1924 年 10 月 26 日)[A].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C].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 [13] [俄] 穆辛. 中国的转折时刻(1924 年 12 月 5 日)[A].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C].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 [14] 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务工作, 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1924 年 11 月 1 日)[A].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C].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 [15] 黄宗汉, 等编著. 孙中山与北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16] 李烈钧将军自传[M]. 重庆: 三户图书社, 1944.
- [17] [俄] 卡尔图诺娃. 加仑在中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18] [俄] 贾比才.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1920-1935 年)[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19] 陈锡祺主编.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 [20] 邹鲁回忆录[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 [2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丛书(第 6 卷)[A].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上)[C].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22] 尚明轩, 等编. 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2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丛刊·善后会议[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5.
- [24] 邵元冲日记[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 [25] 郝盛潮编. 孙中山集外集补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26]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 [2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 [28] 刘仁静. 鲍罗廷[J]. 中国青年, 第 108 期(1926 年 1 月 2 日).

(责任编辑: 郭荣华)

① 张太雷:《〈鲍顾问演讲集〉编者序言》,原载《鲍顾问演讲集》,1927 年 4 月汉口民国日报馆出版,转见《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250 页。